

燭照臺灣日治時

——評介呂紹理著《水螺響起》與《展示臺灣》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圖書出版公司，1998。216頁。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452頁。

莊勝全*

自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歷史學家已逐漸擺脫傳統只注重上層社會的政治史與思想史的操作方式，改從社會中去尋找多元和具有衝突的文化課題，著手研究的焦點亦逐漸轉向普羅大眾，強調的是「自下往上觀察的歷史」(viewing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¹這種觀察視野的轉變對於史學作品所呈現的風貌亦多有影響，並帶動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無獨有偶地，臺灣史的研究關於政治議題方面在許多史家前輩辛勤筆耕之下，已奠下豐碩的基礎供後輩史家開拓新課題，致使社會與文化面向的作品也開始不斷地推陳出新。其中，呂紹理以「時間」與「博覽會」作為切入點，剖析日治時期臺灣殖民社會的生活景況，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¹ 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6：3(臺北，1995.9)，頁 156-157。

近十年內陸續推出本文所評介的兩本專書，不僅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亦對於日治時期的研究增添不少亮麗的光彩。在進入正文之前，評者先對作者的背景及其學術傳承做一番簡介。

呂紹理，1961年生，臺灣南投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一書乃是呂氏針對其於199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而來。呂氏自身認為《水螺響起》可依照杜正勝的分類，定位於「物質」與「社會」的層次。²而在《水螺響起》完成後，呂氏則醉心於此書中隱含關於日治時期的諸多議題，包括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博覽會的議題、日治時期臺灣的旅遊景況……等等，在陸續完成近十篇獨立的文章後，於2005年趁勝追擊推出本文所評介的另一代表作《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這兩本著作前後之間有何關連，以及各具有何種特色，是本文評介的要點之一。以下即先後就《水螺響起》與《展示臺灣》的內容作簡要的介紹。

《水螺響起》所想要解答的問題為日治時期「標準時間」制度的引進以及對日常生活造成之影響。作者指出，若是傳統中國與工業革命後的英國社會一如楊聯陞與湯普森(E. P. Thompson)所發現，時間觀念皆有受到宗教活動型構的一面，則臺灣日治時期時間觀念的改變則受制於殖民政府的牽引。「標準時間」制度的產生與交通系統的發展(鐵路、電報等)密切相關，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欲與世界接軌，則勢必也要融入這波潮流之中，隨後連帶的，臺灣這塊殖民地也必然需要共襄盛舉，從傳統壺漏、燭刻、香印……等計時系統中脫離出來，改由鐘、錶這類的現代報時系統所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其實這股趨勢從1860年代開港後就已經開始，再經由劉銘傳新政的推展，以及日本政府的強

²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1。

化後，生根於臺灣社會中，並從日治以後開始大量進口日本製的鐘錶。

日本政府對於標準時間的設立是由從上而下的灌輸，總督府與地方警察制度相互配套的系統，再由「午砲」與「時的紀念日」的宣導，形成一套官方的論述。另外，教育則是另一項宣傳的利器，透過外在「學年」、「週」、「暑假」的制約，以及內在算數、體操、國語、修身等課程內化的配合，對學生的影響不言可喻。至於社會大眾，則透過社會教育的宣傳來達到目的，包括生活周遭的事物都可能是媒介，而最顯著的例子當屬交通運輸系統(鐵、公路)的推展，除了「準時」觀念的確立，民眾的時間也被切割得更為細緻，不過，這個影響因為城鄉的差距而不一。而殖民地的工廠制度則更是一個強迫民眾接受時間制度改變的場域，民眾工作不再依照生理時鐘，而是轉依工廠所發佈的訊號(如「水螺」)，只是當時民眾似仍未意識到這層轉變，因此每每在勞工運動中，對於「工資」的訴求遠多於對「工時」的檢討。

新時間觀念的引進另一個影響便是休閒活動的重組。日本政府將近代的休閒方式引進臺灣，再透過宣傳(如博覽會)及有計畫的成立觀光機構(如「國立公園」)並加以結合鐵道運輸後，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活動便深受其所牽引。至於廣大的勞工民眾，不要說休閒，他們可能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另外一個影響領導階層的事物則屬廣播，它除了重新對「私密性」加以定義之外，也肩負著殖民訊息傳遞的任務，甚至，重整了民眾的生活步伐。總之，透過行政體系、教育制度全力推動新式的時間制度，臺灣民眾對新時間的認識特別反映在日常生活作息上，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民眾更感受到時間的壓迫性。但作者亦指出，「中流階級」對比較能深化與內化，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新式時間制度只是加強了殖民政府的動員力量，但個人自主掌握時間的觀念和習慣卻仍未普遍建立。

《展示臺灣》則是呂紹理以博覽會為窗口，窺視日治時期臺灣殖

民社會 / 文化面貌的作品。作者首先回顧晚近二十年來的博覽會研究，並歸納出五類研究取徑：史實重建、「行動者」(actor)觀察視角、視博覽會為豐富的象徵文化場域、近代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施展的結果與「現代性」(modernity)的龐大表徵。之後作者提出本書除了延用規訓權力的方式分析外，也同樣關注於博覽會的娛樂面向與教化功能，也就是詳加探討博覽會再製復延的作用。接著作者以 1851 年英國所舉辦的第一場「萬國博覽會」為開頭，回顧英、法、普、美等列強舉辦博覽會的歷程，這些個博覽會在揭櫫進步與競爭精神的同時，也無形洩露它們知識分類的架構，特別是將其智識水準凌駕於殖民地的優越感表露無疑，因此原住民族便成為博覽會展示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日本進入 1860 年代以後開始也搭上這一波博覽會熱潮，並與「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思潮相互輝映，不僅參展國外的博覽會，也在國內親自舉辦，其中尤以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最受重視，並展現出從追求西方「文明」到建構日本「文化」的一面。日本舉辦的博覽會所展現在媒體、經濟與政府間的複雜關係顯示，政府主導的色彩濃厚是他們與西方博覽會最大不同之處。

日本政府領有臺灣後，不論對內對外，博覽會都是很好的宣傳工具。因此在統治初期，總督府便不時參與國內其他地方政府舉辦的共進會，並參加 1900 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與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展覽，而茶葉也逐漸成為臺灣在展場裡不可或缺的特產。1903 年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強調誇耀與富庶，會場內「臺灣館」的設置成為帝國榮耀的象徵，有積極宣揚統治政績的一面，也包含政經宣傳、拓展商貿和知識教化的目標。這場展覽會吸引數以千計的臺灣人到日本島內參觀，並連帶造訪大阪、京都、名古屋和東京，這些城市對臺人而言是更大的展覽會場。許多感受到日本島內進步的臺灣觀察者返臺後，紛紛在報紙上發表他們對於教育、經濟、交通及衛生的看法，無

形中強化了殖民政府「殖產興業」政策的合理性。這場博覽會不僅塑造殖民臺灣成功的形象，也建構了殖民地臺灣的形象，之後臺灣在各類國內外的博覽會的宣傳上，都以此博覽會為基礎，並加以承續、複製與變形。例如 1904 年的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喫茶店」被定格為臺灣展示最重要的手法；1907 年舉行的東京勸業博覽會，臺灣館從原本殖民地宣傳的角色，一變而成具有觀賞娛樂與商業色彩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個博覽會空間結構的配置上，臺灣被視為「外地」的展示手法屢見不鮮，臺灣展品總是與其他地區的展品區隔開來。因此，大阪博覽會將臺灣配置在動線的終點，顯示出視臺灣為最需要被文明開化的地區之心態，「臺灣館喫茶店」則成為休憩、消費並混雜著帝國想像的空間。

除了多次參加國外的博覽會與在島內自行舉辦博覽會外，殖民政府也在臺灣境內實施這項宣政工具。從最初的物產品評會與物產陳列所開始奠基，至 1908 年縱貫鐵道通車之後所帶來的效應之一，即為展示規模不斷的擴張。而「汽(火)車博覽會」、「臺北勸業共進會」也搶搭這股通車熱潮來拓展財源，這場共進會更吸引日本閑院宮載仁親王來臺訪查。1916 年的「始政二十週年臺灣勸業共進會」是在南進政策開始執行的背景下所舉辦，因而具有多重的目標，也是臺灣第一次大開門戶的大型展示活動，會場則定於尚未完工的總督府。在這場盛大的博覽會中，禮儀、教化、(被)觀看、同化、矛盾、綏撫等元素不斷交錯，活動也呈現多樣化，除了展場本身，還兼有參訪臺灣、學術及行政會議、運動競賽、臺灣廟會活動等等。這場博覽會不僅加強殖產興業與開發東南亞的目標，也引發臺灣在進入大正年間（1912-1925）後的展覽熱潮，展覽活動逐漸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諸種政治社會條件的配合下，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盛大展開，展覽場地分成第一會場（日本統治臺灣的特色與成功）、第二

會場(休閒與教化)、南方分館(野趣與驚奇)與板橋鄉土館(文藝)四處，並在臺灣其他各地設置分館，規模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帶來的人潮與商機更是前所未見。而臺灣人對於這場博覽會的看法大致上有四種態度，大稻埕的紳商著眼於現實的生存問題；有些臺人對於博覽會中日人所編排的歷史場景採取抵制的心態；對於知識份子而言，他們以平淡的語調道出旁觀者的心聲；一般的平民對參加博覽會這件事，則抱持著看熱鬧的心情。

伴隨博覽會而來的效應，便是博物館、百貨公司等創建。日本在古文物遭受西力衝擊而逐漸消逝的情況下誕生博物館來珍藏之，臺灣則是由於殖產興業的概念而有「總督府博物館」以及「商品陳列館」的設置。前者典藏的是臺灣的自然資源和突顯殖民政府對臺灣自然資源的掌握與開發，後者傳達將自然資源轉換成可用於經濟生產的過程的訊息，並提供庶民消費的視野與建立商業網絡的管道，也逐漸成為地區性重要的現代文化展演空間。除此之外，博覽會也刺激臺灣近代廣告業與百貨公司的興起，並與傳播媒體的關係極為密切。博覽會需要廠商的廣告贊助費，廠商販售的商品透過博覽會的展示後則會加強其商品的權威性，形成一種共生關係。而博覽會一方面傳遞工業技術與文明進步的知識教化，另一方面也刺激人們對物質生活的想像，這些意象大眾得以透過百貨公司來實踐之，因此百貨公司不只是販賣商品的場所，更是視覺消費的場域。眺望與觀覽是博覽會再製延續的一股強大社會力量，因而影響了臺灣的旅遊活動。最後，配合著博覽會而起的便是「制度化」的旅遊，包括旅遊組織的生成與旅遊活動的普遍化。這是由於旅遊是政府展示統治成果的利器，配合都市化與作息節奏的改變、交通網絡愈行細密，以及旅遊機構、旅行系統和旅遊手冊的產生，種種因素環環相扣造成的結果。政府所規劃的旅遊活動造成制度化觀看臺灣的方式，這個影響可以在政府與藝術家之間在「臺

灣八景」的建構運動中，既脫隊又歸隊的曖昧關係中看見。畫家們擷取與官方認知不同的臺灣各處之地景加以符號化，之後卻又透過印刷與宣傳成為人們認知地景的固定形象，影響所及在戰後甚至成為一個地方「在地認同」的指標。

總而言之，在各式各樣的博覽會上，日本政府屢屢藉著建構「差異化」以建構自我認同，這可以從博覽會場上五個方面看出端倪，即空間布局、建築形式、物件展示、原住民族人種展示與博物館制度化。其所欲達到的目標與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就政治面而言，博覽會具有高度政治紀念與儀式化的目的，並增進「殖產興業」與「文明開化」觀念的灌輸，使臺人積極參與展示活動，但並非所有臺人皆順服此觀念，挾帶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往往拒斥之。就經濟面而言，博覽會所帶來的經濟效應則是值得肯定的，不僅吸引資本，也形塑臺灣與日本地方社會的商業網絡。博覽會也帶進新的展示手法，所展示的物品陳列方式，也刺激了百貨公司的誕生。在社會文化方面，博覽會所流露的知識分類的結構，顯示出容納不下傳統臺灣文化的一面。臺人在博覽會中的作用僅止於出錢協贊、出力觀看，卻缺少主動參加策劃的機會，也喪失了自我表述的可能。在空間形構方面，博覽會對於臺灣的都市面貌而言，並未成為改變力量的來源，而僅僅確立都市位階的概念。但對於旅遊活動中地景的重新配置則產生重大的影響，形塑許多地標與在地認同的符號。

本文重點式的介紹工作已如前述。通覽兩書，可發現以下特點：一、作者旁徵博引，舉凡文獻檔案、報告書、官方出版品、時人著作、報紙雜誌、視覺圖像材料、小說與歌仔冊等等，皆在其蒐羅寫作之列，包含日文在內所徵引的中外二手材料，更是不勝枚舉。作者蒐羅、彙整與解讀材料的能力，值得評者加以推介。二、除了文獻的解讀外，作者這兩本著作也援引了許多理論當作其論述的利器，例如《水螺響

起》是受到年鑑史家布洛克(Marc Bloch)的啓發所致，才使作者對「時間」的議題加以重視，另外湯普森、勒高夫(Jaques Le Goff)、矢內原忠雄等著名學者的理論，也對本書有啓發之功，在結論部分作者更引用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理論說明日本殖民政府帶進各種時間觀念、制度的「局面」(Conjuncture)，影響所及足以滲入民眾生活的各「事件」(Event)中。至於《展示臺灣》在理論的應用上更臻完善，如上所述，作者先加以歸納五種博覽會的研究取徑，而在全書中則不時可以見到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規訓權力施展下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理論貫串其間，此外，在解釋博物館和百貨公司與博覽會的關係時，則援用班奈特(Tony Bennett)「展示叢結」(exhibitionary complex)的理論加以說明，而在描寫旅遊的觀看文化時，作者藉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與麥肯納爾(Dean MacCannell)的理論點出旅人只習於觀看自身熟悉的景物，因此旅遊是被調製的「擬制事件」(pseudo-events)，而旅人觀賞到的文化圖像亦有「前臺」(front stage)與「後臺」(back stage)之別。由上可知，這兩本著作皆屬理論與實作融合的佳作。三、這兩本著作都同樣致力於探索日治殖民政府的政策對於民眾日常生活影響的一面，《水螺響起》以標準時間制度為切入點，發覺現代的時間觀念改造了民眾的生活作息與工作時態，甚至重組了休閒生活；《展示臺灣》指出日本政府屢屢透過國內與國際博覽會，展示、建構及塑造臺灣的意象。並藉著博覽會的效應在博物館、商品陳列館與百貨公司發酵出不同的物質消費文化，影響所及甚至擴及民眾的遊觀心態。這些皆在前面有所介紹，無庸贅言。但需要加以注意的是《水螺響起》偏重於社會層次上討論，描述的方向在於可捕捉的社會生活實景上，《展示臺灣》則著重於權力架構形塑的一面，也更深入的去探求受博覽會活動影響下，芸芸眾生的心態觀。四、作者在兩書的寫作過程中，皆不斷發現新的研究題材與方向，並適當呈現於作品內。例如《水螺響起》指出博覽

會的研究、休閒旅遊觀念的形成和廣播所帶來生活上私密性的轉變，³都是值得再加以深入探討的課題，作者本身更針對前面兩項親自示範，於《展示臺灣》中加以發揮。而《展示臺灣》書中也同樣提示讀者未來研究的新方向，包括日治時期的地景符號與觀覽文化，在戰後是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形式與面貌被保留與呈現出來？日治時期的圖書館事業中，其知識建構、展示與分類的取向也仍有發揮的餘地。此外，農業品評會對於農民農業知識的認知系譜的影響又是如何，亦值得進一步探究。⁴

這兩本著作為臺灣日治時期的研究開創了新的路徑，但兩書中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茲爰述如下：一、兩書皆有層次的指出標準時間與博覽會制度是由西方開風氣之先，經由日本學習後，在本地施行並引進到臺灣來。因此日本經驗是臺灣的範本，西方的經驗又是日本引為借鏡的。但是經過一手與二手模仿後傳到日本以及臺灣後施行的樣貌不可能與他們進行模仿的對象一樣，因為這是日本政府有選擇性援引與傳授的結果，加以文化背景不同所致，而這恰好形成一種有特色的統治工具。但是這樣一面學習，又一面加以改變所透露的意義為何？作者在兩書中皆未加以解釋與剖析。岩淵功一從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角度指出，日本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在異國情調的塑造上與西方是有共犯結構關係的。日本一方面強調「日本特性」以塑造認同，另一方面也排拒了弱勢者的聲音，形成一種自我的東方論述(self-Orientalism)，鎮壓內部不同的聲音。日本越談論西方這個有份

3 集中於本書的第5章，參閱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145-176。

4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390、402。

量的「他者」，就越能確立其優越性。⁵在這樣的情境下，臺灣與阿伊努人、朝鮮人、蝦夷人同被打為少數的弱勢族群。因此在日本參與和舉辦的博覽會裡，日本自身參展的選擇是哪些？同為弱勢的其他族群又如何被再現或忽略？與臺灣的參展部分有何異同，其中又透露何種訊息？在動線的配置上，他們又被安排在何處，較之臺灣的布置方式又如何？或許這是作者可以加以引伸的一個部分。

二、如前所述，這兩本著作皆著眼於殖民政府的政策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不過較少提及的卻是民眾對這些迎面而來的改變是如何去理解、接受、拒斥或改變。以《水螺響起》為例，誠如作者自身所坦承，本書並未涉及「精神」層面的探討，關於這點，最大的原因為史料不足，因此有關於描寫群眾反應時，大多僅能從小說中捕捉其身影。然而這個侷限隨著各項領域與課題的開展，史家可賴以分析的材料範圍也逐步擴充，其中小說更被視為是捕捉辯證性文化創造活動的最佳材料。⁶作者在書中曾以兩則小說故事為例，說明水螺對日治時期工人生活的影響與衝擊，甚至是其情緒上的反應，可惜作者僅點到為止，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心態摸索，但足見這確實是值得再加以深入研究的一個方向。畢竟，群眾從來就不是沈默的，更不是待宰的羔羊，作者在本書所引介紹中文讀者認識的英國史家湯普森就屢屢指出，下層階級在歷史中不只是外在決定力量的犧牲者，他們在打造自身歷史

5 岩淵功一著，李梅侶等譯，〈共犯的異國情調——日本與它的他者〉，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 191-199。

6 這個辯證性活動的過程不僅小說家自身，包括其讀者亦參與其中。小說的敘述情節並非全是反應現實的材料，但卻可倚傍為破解文化密碼的切入點。參閱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頁 16-17。

與界定文化認同的同時，扮演著活躍又絕對必要的角色。⁷作者對此當不陌生才是。

三、承續上一個話題，在探索民眾心態的描寫上，《展示臺灣》則是明顯多了。例如作者在談論 1935 年臺人對「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反應時，透過對報紙、小說、日記與歌仔冊的分析，作了四項分類：紳商將博覽會視為歷史解釋權與拓展商機籌碼；不認同日本政府的臺人則是大力反對博覽會；一般民眾抱持著看熱鬧的心態；知識份子則界乎其間，既不反對，卻也不積極參與。作者的分析鞭闢入裡，但卻也面臨代表性的風險。畢竟，以少數人的記述與言論便化約作一整群人或一個階級的觀感，評者以為是有所不足的，但這無損作者關懷群眾心態的用心。

四、這兩本著作在某些議題的探討上，皆有值得再深入探討的課題與延伸發展的可能性。首先，《水螺響起》一書的命名便是作者以水螺當作是日本政府推行新時間制度的表徵，以此為切入點觀測新式時間制度對民眾日常生活作息的影響。法國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也同樣上演著類似的戲碼。法國史家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以「鐘」作為憑藉，道出大革命後政府對鐘及其聲響的嚴密控制，對法國群眾的日常生活、認同、權力結構和社會秩序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形塑著當時的聽覺文化，一直要到郵件與時鐘的普及，才結束這一段文化抗

⁷ 蘇珊·德山(Suzanne Desan)，〈E. P. 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社群、群眾與儀式〉，收於林·亨特(Lynn Hunt)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 91-92。而在 1966 年，湯普森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發表名為〈民眾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文章後，民眾史的概念形成了歷史學家普遍的說法。參閱吉姆·夏普(Jim Sharpe)著，陳建守譯，〈民眾史〉，收於孫遜主編，《都市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181。

爭過程。⁸有關政府對於認同、時間與日常生活掌控的課題方面，阿蘭·柯爾本所操作與延伸的面向，或許可供作者參考。另外，在《展示臺灣》中作者觀察到博覽會帶動的旅遊文化和制度化觀看臺灣的方式。關於旅遊方面的議題，英國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研究十七世紀英國旅行者至義大利旅遊時發現，前人的旅行見聞錄雖是很好的指引，卻也形塑了不少的偏見與觀察的視野，形成許多文化刻板印象。但也由於不同的生活背景(宗教、語言、氣候與習俗)，致使旅遊者對不同群體間所洩露的文化差距往往有銳利的觀察，意即這些旅遊者會特別留心他們認為是奇特的事物，他們的旅遊記錄便是在文化刻板印象(cultural stereotype)與個人觀察(personal observation)間交織互動而成，⁹這與作者所援引的布爾斯廷之理論有相仿之處，評者認為作者可與柏克的研究進行參照。而在關於外籍人士、日本皇親與官員、知識份子和臺灣民眾間所察覺到旅遊景致，由於身分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評者認為作者應進一步進行比較與說明。

五、評者在臺南進行口述訪談時，曾經訪問到現年 83 歲(1924 年生)，日治時期在糖廠服務的陳莊夢女士。當時陳女士服務的糖廠是用敲鐘而非使用水螺的方式報時，在當時水螺是用來作為躲避空襲的警報器，而陳女士便是鳴水螺提示糖廠員工躲避空襲的人員。可見日治時期，臺灣內部對於水螺的功能有不同的定義，也發展出不同的報時系統，關於這一點，評者建議作者可再做更進一步的探索。而作者認

⁸ Alain Corbin, translated by Martin Thom, *Village Bells :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譯本見王斌譯，《大地的鐘聲——19世紀法國鄉村的音響狀況和感官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⁹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4-101.

爲日籍畫家在「臺灣八景」塑造過程中，與政府的關係呈現既脫隊又歸隊的現象，也固定了臺灣的地景形象，作者在此偏重的是日籍畫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然而受到日籍畫家影響的臺灣畫家，在這方面的宣傳上亦有所影響。例如羅秀芝以霍米·巴峇(Homi Bhabha)的後殖民理論說明臺灣畫家對於日本「殖民論述」下的美術觀，有擬仿(mimicry)與混雜(hybridity)變種的一面，成就自身的「臺灣風景」；¹⁰劉方瑀則指出臺灣畫家雖有呈現在地思考的一面，但在殖民政府的評審機制下，卻成了彰顯臺灣異地風光的強化劑。¹¹藝術方面的再製複延，或許也值得作者思考。

呂氏這兩本著作雖有上述評者所提出的疑點，但並不足以掩蓋其價值。透過這兩本著作的帶領，讀者不僅可以看到以往史著中皇親貴胄與統治高層等熟悉的身影，社會領導階層與知識份子的價值觀亦躍然紙上。甚至，過往史家未多有著墨的平民百姓，在呂氏的勾勒之下或許仍有模糊之處，卻也可以隱約窺見其生活風貌和心態。這兩本著作對於後繼研究日治時期的史家而言，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方面皆能有所啓發，實爲此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著作。

(本文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通過刊登)

¹⁰ 羅秀芝，〈石川欽一郎——日本殖民帝國的美術教育者，創造臺灣異己意象的水彩畫家〉(臺中：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110-125。

¹¹ 劉方瑀，〈被選擇的臺灣——日治時期臺灣形象建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136-141。